

周素园与贵州辛亥革命 □ 彭恩钟明会



周素园

贵州作为西南一角的偏远山区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在全国相对滞后，却在辛亥革命爆发之时走在了时代的前列。武昌起义之后，贵州立即响应，成为较早推翻清王朝的六大省份之一，引人瞩目。或许人们会疑惑：一向被认为偏远、落后、闭塞、野蛮的贵州，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如沿海省份，也不如两湖地区，为何却能点燃革命的火花，推动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。这都要归功于以周素园为代表的革命先行者们。

一、周素园为辛亥革命积极奔走

周素园(1879—1958)，原名培艺，别号数元、谢元，贵州毕节县人。他从来都没有在任何学校里读过书，最初启蒙教育来自于父亲，后才拜师于刘恒山、罗友山。由于他从小刻苦用功，晚清时考取功名。同无数的读书人一样，周素园也力图通过读书进入仕途，实现显名扬天下的抱负。但是随着其思想的转变，他逐渐摆脱封建藩篱的束缚，成长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。

立志报国，寻求救国良策。1894年，甲午中日战争爆发，中华民族危机加深，萌发了埋藏在他心中已久的那颗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爱国精神种子。此时的周素园深感生平所学的四书五经已无用武之地，转而开始学习新知识，接触新事物，汲取新思想。即使身在交通不方便，信息不畅通，文化不发达的黔西毕节之地，他也从来不因困难低头，从未向现实屈服。相反，他迎难而上，全身心投入其中。为了能了解天下大势，周素园找来当时诸如《校邠庐抗议书》等先进的刊物和报纸，并一一进行精心研读。通过学习，周素园对西学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。

为早日实现拯救危亡中国的抱负，周素园萌生了出国留学的想法。此时恰逢贵州拟派公费留学生出日留学，当得知消息后，周素园喜出望外，兴致勃勃赶赴贵阳准备应考。不料受到于德楷、李恂因的劝说，要他以“国事为重，牺牲小我”，把兴办贵州事业作

为己任。在二人的强烈挽留下，他最终放弃了留洋的这个机会。至此，他开始由一名传统的“读书做官”、“光宗耀祖”的知识分子向革命战士逐步蜕变，步入革命的行列，踏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2.创立《黔报》，为革命造舆论。起初，考虑到贵州实力薄弱，周素园试图走实业救国这一道路。然而在李端芬的路矿公司工作一段时间后，周素园才认识到，振兴实业无论是对于落后的贵州还是积贫积弱的清王朝已是“亡羊补牢，为时已晚”，彻底变革制度才是根本。他为此总结道：“凡公共事业，类非一手一足之烈，今吾以热诚倡率，而社会冷嘲热讽之，次非社会有不足于我也，患在愚昧而无知”，所以必须“注意教育以开民智”，第一步便是从创报入手。

然而，办报并非一件轻而易举之事。贵州一穷二白，首先要解决的便是资金问题。经过走访打听，周素园逮着了正在准备开办书局的唐尔庸和于德楷。他借此机会向二人道出了自己的想法：希望他们能给于资金的支持。于唐二人经过协商，欣然答应。有了二人的帮助，周素园愈加信心十足。他说：“报章之职务，于社会无所不问。而在革新初期，其需要尤迫切，发行日报，举指导社会之实，更积岁月，效果当有矣。”^[1]于是他决定自己动手，亲自出马。经过两年的精心筹备，他从上海购买了一批印报设备，结识了许多专业技术人员，创办了《黔报》，由周素园担任主编，亲自主笔，并于1907年正式发行。

期间，他在《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警告》中写道：“夫列强之合力经营中国也，亦既有年于兹矣。举凡海陆之险要，天府奥区，大都布算而乘除之，悉衡而轻重之。瓜分之图，均势之论，喧阗腾播于人之口。哀我同胞久已续波兰之覆车，尊非洲之遗轨”，揭露了帝国主义的虚伪面具，同时披露清政府出卖国家主权的罪行，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一次普遍的爱国主义教育，也唤醒了民众的觉醒意识。

自创刊以来，《黔报》常常以报道和评论时局作为风格，颇具特色。它始终秉承非营利和努力提高社会知识水平的宗旨，深受人们称赞，尤其得到了许多青年的青睐。在青年的支持下，《黔报》发行量由300多份猛增到1200份，成为贵州第一份报纸。青年们

写信给周素园说：“你说的都是我们想说的话，贵州本是一个盲哑的社会，你给我们带来光明和喉舌了。你要维护你的报，不要令我们庸生悲，又陷人黑暗和苦闷的深渊里。”^[2]《黔报》对开启民智，宣扬救国，推动知识分子转变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。

3.成立自治学社，开展革命活动。在创办《黔报》期间，周素园同时接受了孙中山先生关于民主革命的思想，加入了同盟会，励志跟随孙中山先生为革命事业奋斗。周素园在一次偶然的相遇中与张百麟结识后，因二人对革命事业都有着同一颗赤诚之心，遂成为至交。对于周素园办报的举措，张百麟认为“报馆只能算是政党的一部分，有了政党才能发生巨大的力量”。经过反思，周素园决定采纳张百麟的建议。他说：“吾人欲求救亡之术，惟有一德一心，组合团体，化除私见，共谋公益。”^[3]

1907年，《黔报》发表《瓜分警告》，大肆抨击帝国主义的野心。张百麟认为是到政党成立的时候了，于1907年11月27日正式成立贵州自治学社。在此过程中周素园也是功不可没的，对诸如“应付官厅社会”等实际工作往往有他出面，他用他的地位和威望对学社的发展起关键作用。

为了取得官方的批准，贵州自治学社以推进宪政为名，向贵州当局申报立案。得到了正式批准后，自治学社以《黔报》为喉舌，进行制造舆论活动，并深入到群众中开展各种革命活动：第一，组织演讲团。为了扩大自治学社在群众中的影响，周素园组织演讲团进行广泛宣传，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现象，时政分析等等。经过宣传，贵州各地都建立了自治学社分社。第二，大力举办慈善事业。自治学社在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，也以帮扶贫困大众为己任。周素园通过组织各种救助活动，一方面为嫫婁孤独提供了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，另一方面也为众多奴仆得到解放打开方便之门，此举不但帮助了孤寡贫弱，还咸里里媳妇之间”^[4]。第三，响应全国请愿。1909年，全国掀起召开国会的浪潮。周素园也积极奔走，成功争取各界代表在《请愿书》上联名签字，将其公开发表，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国会请愿活动。

随着自治学社一系列革命活动的开展，以及在周素园个人魅力的感召下，贵州民众

一、典当行在我国的历史发展

典当是我国最早的金融性质的机构,根据记载,典当行的发展在我国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,也就是4世纪的时代。作为最早的金融机构,典当行的生命力来自于民间广阔的市场,典当行的发展不仅在民间市场上得到了认可,在一些朝代它的发展也受到统治者的鼓励和肯定。典当行的发展状况,往往与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,政治开明经济形势稳定的时候,典当行的发展往往也会取得重大的成就。例如在唐宋时期,由于整个大业的稳定,典当业的发展呈现出了繁荣的态势。在《唐六典》中,为了将典当业进行规范,对当时典当的利率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。在宋朝,典当已经发展成为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行业,在当时的京师汴梁,当铺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,被列入“士农工商”的范畴之内。从当铺的发展演变规律来看,随着时间和经验的积累,当铺经营管理的水平也就越来越高,所以也渐渐衍生出了票号、钱庄等多样性的金融机构,但是无论钱庄和票号在当时的社会金融中扮演着何种重要的角色,当铺都是无法被替代的,它独特的服务对象和服务方式与社会现实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,能够

满足最底层百姓的利益需求。但是在整个封建社会,当铺的发展有过最辉煌的时期,也经历过最惨淡的时期。并且这两种极端的变化出现在一个特殊的朝代,也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——清朝。清朝典当行发展的兴盛,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,它表现在典当铺的数量、规模、进行典当的资本额度等方面。在乾隆十八年的时候,全国的当铺还只有1807家,但是到了嘉庆十七年,全国的当铺已经达到了23139家,这种数量的剧增是前所未有的。但是,到了清朝晚期,社会格局的改变和各种政治因素的加入,社会经济陷入困境,随之而来的就是当铺行的发展经历了一落千丈的危机,这种巨大的落差是当铺行在中国从兴盛到衰败最简短的缩影,本文的主要内容,就是对清朝中国典当行这一段从极盛到极衰的发展历史进行分析。



北京南锣鼓巷五老五老当铺的遗址

二、晚清时期典当行的发展困境

典当作为一个古老的金融借贷行业,在清朝前期有了膨胀式的发展,但是这种兴盛的态势随着晚清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帝国列强的入侵,导致整个中国社会民不聊生而衰败。晚清时期典当行的发展面临的生存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第一,社会局势混乱,财产安全危机。典当行的发展与任何一种金融机构的发展相同,都受到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。到了晚清时期,社会格局的剧烈动荡也使得典当行经历了重大的危机,这种社会局势的混乱最直地就表现在由于经济发展的不稳定,使得许多原本通过正常农作、经商的百姓生活陷入了困境,于是就出现了一批靠抢掠来维持生计的人群。而典当行在清朝前期经历的盛世,也让许多人认为典当

□ 李强

典当行:我国最早的金融机构

踊跃参加,入社社员不断增加,正式社员竟达14.8万人,遍及全省上农工商军各界。至此,自治学社的力量更加壮大,革命的种子也随之撒遍贵州大地。

4.和平光复贵州,取得革命成功。1911年10月10日,武昌爆发起义,其他省份相继宣布独立。此时,周素园、张百麟认为贵州革命的时机已到,决定发动武装起义。经再三商定,由二人一同去说服沈瑜庆,希望他能早日投降,交出政权。不料遭到沈瑜庆拒绝,并暗中加强反革命的部署。在这危急关头,自治学社决定采用武力夺取革命政权。陆军小学于1911年11月包围了巡抚衙门,贵州得以和平光复,成立贵州军政府,周素园被推选为军政府行政总理。

二、巩固维护贵州辛亥革命成果

1.为巩固新生革命政权呕心沥血。辛亥革命之后,为巩固革命的果实,时任贵州军政府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周素园每日劳心劳力,批复公文,几乎没有片刻闲逸。正如他说:“好似一条铁链锁我在一间房子里。一张办公桌上,把旧日一院、三思两道理和二三位秘书、科长、科员分担的职务,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。耳是不断的听,口是不断的说,

手不断的在写,吃一餐饭也得放下碗筷来酬对两三次;鸡鸣后上床睡觉,还让你披衣起来解决问题。”^[1]从中可看到周素园为尽力维护革命政权作出的极大贡献。

2. 退隐之后专注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和总结。1912年3月,充政派不甘心失败,卷土重来,与封建势力相勾结,颠覆了革命政权。政权易手后,大肆屠杀自治学社成员。周素园被迫远走他乡,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。然而,他在逃亡的过程中仍心系革命,在逃亡重庆的途中,发了一封名为《贵州各界海内同胞书》的通电,向全国发出了反党派屠杀自治党的罪行。后又相继发表《黔人血泪》、《贵州血腥录》,为贵州辛亥革命罹难者呼吁控诉,哀伤之情溢于言表。

无奈时局日益趋下,从1920年至1925年间贵州政局急剧动荡,周素园倍增“有心杀贼,无力回天”之感。为表达对旧军阀统治的不满,他于1925年请假离开政界,不再担任职务,隐居在毕节老家,闭门读书、写作,专注于研究和总结贵州辛亥革命的重要史料,著成了《贵州国民党痛史》,为我们了解回顾这段历史留下宝贵材料。其实,革命政权被颠覆后,旧军阀曾多次邀请周素园为官,

如果周素园只贪图个人享乐,他大可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。相反,面对荣华富贵的诱惑,他都毅然拒绝,不为功名利禄所动的革命气概在周素园身上显得淋漓尽致。

纵观周素园早期的革命生涯,正是由于他抛弃个人荣华富贵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,才能从封建传统思想的藩篱中挣脱出来,由一名清末秀才转变为贵州辛亥革命的宣传者、领导者和实践者。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期,正是有了周素园这样的贵州进步人士与时俱进,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,用自己的精神和道义力量推动着革命,才能让地处西南一隅的落后贵州能够紧紧跟上全国前进的步伐。周素园为探索振兴中华救国救民的道路,表现出的不畏强暴,不畏艰难的精神可歌可泣。就连毛泽东也对其在辛亥革命中的奋斗和贡献所感佩,赞扬道:“他是一个奋斗的人,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。”^[2]

参考文献

- [1]梁燕,葛英.周素园文集[M].贵州人民出版社,1994.
[2]陈朝祥.周素园与贵州旧民主主义革命[J].毕节师范学院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),2004(1):3.
[3]周素园.周素园文集[M].贵阳:贵州人民出版社,1994.
[4]周达恩,周素园——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[J].贵州教育学院院报,2002(3).
★作者单位:遵义师范学院历史系。